

揭批“四人帮” 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炮队”

——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申克鼎（1）

论罗思鼎……………申涛声（17）

“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罪行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32）

覆灭之前的狂吠

——批判姚文元利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红旗》

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42）

“四人帮”及其余党怎样操纵上海两报鼓吹反革命

政治纲领的……………解放日报批判组 文汇报批判组（50）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65）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向 群（79）

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

——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国家计委大批判组 (101)

一块用来向党猖狂进攻的石头

——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朝农经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 (123)

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

——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

“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129)

反革命野心家——迟群.....教育部大批判组 (136)

揭“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的老底.....文化部批判组 (148)

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马天水.....上海师范大学批判组 (162)

人民的痼疽 敌人的宝贝

——揭露政治流氓陈阿大的反动面目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大批判组 (175)

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 政治纲领的“炮队”

——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

申克鼎

“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集中反映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继承了林彪的衣钵，是林彪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一谬论的翻版。江青说：“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的一支得力“炮队”。它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打转的。

“路线交底”，“炮队”上阵

“四人帮”公开抛出反革命政治纲领是在一九七六年，但它的酝酿、形成，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紧密勾结，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革命老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进一

步大造反革命舆论，实行“改朝换代”的阴谋计划，张春桥在一九六九年夏，以“读书”为名，每天晚上派车把后来成为“炮队”头目的三个人接到自己的住所，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对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思想灌输。这个活动被称为“路线交底”。交什么底？就是交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底，交“改朝换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底。经过这一番考查和训练，张春桥认为这三个家伙忠实可靠，就以他们为核心，逐步搭起写作班子。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经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提议，正式建立“炮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

“炮队”建立以后，就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部署，向革命干部和群众开炮，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谁是妨碍“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炮口就对准谁。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他是“炮队”的主攻目标；周总理病重和逝世以后，“炮队”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炮队”又施展卑劣手段，进行恶毒攻击。“炮队”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反周总理，反华主席，反邓小平同志和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归根到底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多年来，这支“炮队”用罗思鼎、丁学雷、齐永红、方岩梁、官效闻、康立、石仑、戚承楼、任犊、石一歌、金凤等好几十个笔名，炮制了黑文一千余篇。它肆意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上，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它把黑手伸进文史哲经科教各个领

域，呼风唤雨，推涛作浪，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泛滥，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喧嚣一时。它盗用大学、出版社的名义，一手把持《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八个刊物，操纵舆论工具，与“梁效”南北呼应，为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使出浑身解数，效尽犬马之劳。还应当指出，这支“炮队”挂着写作组的招牌，暗地里却干着特务勾当，起着“四人帮”的“情报局”和“智囊团”的作用。它用卑鄙的特务手段，千方百计搜集、伪造并私印、散发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大量盗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上送“四人帮”。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前后就有一千多份，而张、姚给“炮队”下达的批示、书信、电话，也多至三百六十余次。每当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四人帮”往往对“炮队”头目有所咨询，而头目们也积极出谋献策。这充分反映了“炮队”在“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影射攻击，气焰嚣张

在“四人帮”的卵翼和操纵下，“炮队”一经建立，就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针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对经济、文教、科技等各项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炮队”对这些指示无不加以恶毒攻击。周总理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他

们就攻击这是“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周总理对办好国营农场作了重要指示，“炮队”抛出黑文，恶毒诬蔑周总理的指示是“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周总理多次指示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炮队”对此发动了反革命围攻，甚至通过一出小戏《抗寒的种子》指桑骂槐，攻击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织自己的“内阁”，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打倒周总理，架空毛主席。他们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宰相”，批所谓“现代大儒”，矛头直指周总理。“炮队”如响斯应，接二连三地开出批“宰相”的排炮。批吕不韦，批霍光，批田千秋，批赵普，批司马光……，仅仅《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就一口气点了七个宰相的名。

“炮队”不仅批古代的宰相，还批近代的宰相。它请出了李鸿章的亡灵，刮起了一股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妖风。早在一九七〇年，周总理就指示，力争一九七五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完全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炮队”却借机恶毒攻击买船是“崇洋媚外”，在《学习与批判》和《朝霞》上放出了《评“崇洋有理”》、《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故

事新编《李鸿章出洋》等一连串“炮弹”。这股批“崇洋媚外”的妖风，借“风庆轮问题”越刮越凶。原来，一九七四年十月正是“四人帮”阴谋“组阁”夺权活动最紧张的时候。他们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妄加罪名，点名批判交通部，攻击国务院，要把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当代的李鸿章”。就在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状的前三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拥而上，在一份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批了许多黑话，叫嚷什么“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炮队”闻风蠢动，倾巢而出，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又是小说，又是戏剧，又是广播，又是电视……，大头目洋洋自得地说：“我们这次宣传，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配合得很好。”尽管“四人帮”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又有“炮队”卖力地鸣炮助威，王洪文到长沙告黑状，却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

“四人帮”还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把矛头针对叶剑英副主席和大批军队领导同志。王洪文的秘书、“炮队”的原头目之一听到“放火”信号，立即从北京打电话给“炮队”，布置“写部队题材”的作品。经过他事先定主题和事后修改，一篇题为《闪光的军号》的毒草小说在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朝霞》上抛出了。此文把一个副师长写成压制“批林批孔”、不听“四人帮”号令的“民主派”、“走资派”，最后被赶走完事。写“军内走资派”，系从此文始。

“四人帮”假借“评法批儒”，把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诬蔑为“现代的儒”，把自己一伙打扮成

“现代法家”。姚文元对“炮队”的头目们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法家。”头目们心领神会，在报刊上率先抛出“二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的反动论点，又胡诌什么西汉初期法家路线所以能“遵而不失”，是由于中央有一个吕后为首的“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为“四人帮”的“组阁”制造理论根据。“炮队”为了把江青捧上女皇的宝座，不仅给吕后、武则天戴上“法家”的桂冠，而且向她们献上“哲学家”的头衔，塞进《哲学小辞典》的人物条目中去。

“四人帮”及其“炮队”在“批林批孔”的幌子下，为了阴谋“组阁”而进行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非但没有得逞，反而暴露了自己。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野心，多次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随后，又委派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幻梦破灭，“炮队”的这次猖狂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反对整顿，大肆反扑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歪曲、篡改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一九七五年初，张春桥准备炮制那篇臭名昭著的黑文前，就写信要“炮队”的头目们出点子。头目们立即替他整理了一个所谓工人阶级队伍状况的“调查”材料，诬蔑老工人已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

行”，为拼凑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张春桥思想”提供论据。

一九七五年三、四月，“四人帮”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周总理和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遭到毛主席多次严厉的批评。毛主席并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尖锐地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指出“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严重情况，并对《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强烈谴责“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并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提出对各方面的工作要整顿，以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四人帮”受到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批评，日子很不好过。姚文元、王洪文于七、八月间相继窜回上海，暗中磨剑，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姚文元到上海不久，就把“炮队”的头目们找去，针对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恶狠狠地叫嚷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炮队”随即炮制了一篇黑文，题目就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把姚文元反对毛主席批评的黑话，如“不怕围攻”，“不怕骂”，“真理是骂不倒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历来在谩骂声中诞生，在谩骂声中成长”等等，统统塞进黑文里去。此文到了姚文元手里，他觉得时机未到，批上“备用”二字，搁了起来。姚文元阴险地对“炮队”的头目说：“你们不要急，反错必出错，到一定时候出来讲话比较合适。”

不久以后，这个“一定时候”，“四人帮”自以为盼到了。八月，毛主席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评论。姚文元认为有机可乘，仅仅三小时之后，就提出了“贯彻”毛主席批示的所谓办法。他蓄意篡改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一个“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黑命题。并立即把毛主席的批示和他的黑命题捅给了上海的“炮队”。

“炮队”的头目们欣喜若狂，连呼：“我们的丹书铁券来了！”就在当月的《学习与批判》上抛出了《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一文，说什么宋江“把卢俊义等投降势力安插到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坚持晁盖路线的李逵、吴用、三阮、朱贵则受到排挤或贬低”，一面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诬蔑落实政策、让一批革命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是拼凑搞“复辟”的“黑班底”，一面又厚颜无耻地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受排挤的“革命派”，妄图实行反攻倒算。

“炮队”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不仅猖狂地反对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而且恶毒地攻击工业的整顿。七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国务院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二十条》），这是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整顿工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四人帮”对此切齿痛恨。九月，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政治野心家马天水，要“炮队”的大头目组织力量“研究”《二十条》。这个“任务”落实到了掌管经济组的头目身上。这个家伙竟私自翻印《二十条》草稿，接着，又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一夜之间，将早就用各种卑劣手段搞到的几十份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讲话记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突击摘编出所谓“经济战

线上的奇谈怪论”一百一十八条，散发到基层“供批判”。这份黑材料，矛头主要针对邓小平同志，同时还涉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它比“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指使清华大学材料组炮制的所谓“言论摘录”，还早二十天。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去年三月，“炮队”盗用工人的名义，炮制一篇黑文，刊登在《学习与批判》上，在全国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二十条》。“炮队”根据姚文元旨意炮制的另一篇不点名地批判《二十条》的黑文——《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四人帮”公开批判《二十条》，反对整顿工业，打响了第一炮。

与此同时，“炮队”又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了那篇题目长达三十三个字的黑文。这篇黑文是有来头的。在这之前，张春桥曾不止一次地借鲁迅小说《风波》大谈其辫子问题，指使其党羽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去揪“辫帅”张勋，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炮队”根据张春桥的黑话加以发挥，刮起一股揪辫子风，大叫大嚷要“清除张勋一伙辫子党和赵七爷这样的盘辫党”，为“四人帮”层层揪“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抛出纲领，发起总攻

一九七六年第三期《朝霞》抛出了一篇“带头”的小说，题目叫《总攻发起之前》。这篇由“炮队”掌管文艺的那个头目亲自动手“拔高”的、写到市一级“大走资派”的小说，结尾杀气腾腾地狂叫：“大刀出鞘，枪弹上膛，……

千万门大炮……发起总攻击了！”

“炮队”的感应神经的确很灵敏。此时此刻，“四人帮”确实向党向人民发起了总攻击。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无疑给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一个沉重的打击。“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又怕又恨。张春桥、姚文元对“炮队”头目面授机宜，强调要“关心阶级斗争的大形势”，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且露骨地示意说：“今后的斗争，看来也是暴力解决问题”，表达他们不惜一切，坚持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决心。

“四人帮”及其“炮队”就是这样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把总攻击的“炮口”对准着华国锋同志，对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

正是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中，“四人帮”正式抛出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纲领出笼，总攻令下，“炮队”火速行动起来。一九七六年二月底、三月初，他们伙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张春桥的黑指示，十万火急地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所谓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文艺作品如何表现同走资派作斗争等问题，妄图把整个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引到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张目的轨道上来。紧接着，“炮队”加紧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炮制关于“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报告稿，四月初在上海一次万人干部大会上宣讲。在同一次大会上，“炮队”的大头目也登台表

演，借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题目，大做反革命文章。江青曾叫嚷：“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这两个家伙在大会上也是一唱一和，从各方面“论证”这个所谓“客观的必然规律”。按照这个反革命基调，“炮队”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和书稿，塞满了上海的报纸、刊物、广播、出版物，到处充斥着揪“民主派”、“走资派”的喧嚣声。他们根本颠倒敌我关系，狂叫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甚至胡说什么“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在“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什么“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是一项基本任务，如此等等。他们为了给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依据”，这样肆意地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比之历来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炮队”不仅从理论上宣扬反革命政治纲领，而且利用文艺创作、历史人物评论等各种手段广为放毒。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提出文艺创作要搞“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并强调写的“走资派”级别要高，要刻画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要指出这种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他还点名要一个作者写反映“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小说。这篇小说以一位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为主角，用心险恶地把他刻画成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有个性的“走资派”的“典型”，最后落得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下场。“炮队”掌管文艺的那个头目，亲自给小

说定名为《历史的审判》。小说炮制完成了，终因“四人帮”垮台而未及出笼。

为了与反革命政治纲领相呼应，“炮队”又制造了一个“半截子革命派”的谬论，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是张春桥读了《学习与批判》上连载的《汪精卫卖国记》，对“炮队”说什么：“把汪精卫一开始就写成软骨虫、卖国贼，那一部历史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了”。于是，“炮队”在出版单行本时，就把汪精卫改为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反革命的人，为这个大汉奸涂脂抹粉；同时又大力炮制如章太炎、普列汉诺夫等所谓“半截子革命派”的传记，借以影射攻击革命老干部。

紧密配合着“四人帮”疯狂攻击华国锋同志的罪恶阴谋，从四月份起，“炮队”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刮起了一股批“上台”的阴风。与此同时，“炮队”又颠倒黑白，在所谓批“三株大毒草”上要弄阴谋伎俩。“炮队”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提供的材料，在四月份的《学习与批判》上，同时刊出了《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等三篇黑文。其中的一篇，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接着，“炮队”又特派掌管经济组的头目进京，去摸有关《二十条》的所谓“情况”。此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很快搞到了《二十条》的前后六种稿本，写成了一个黑报告，其中特别讲到：“《二十条》是在国务院务虚会基础上形成的。”这个黑报告呈给了王洪文。后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策动余党猖狂地追所谓“风源”，大肆

诬蔑国务院务虚会，阴谋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一严重反党事件，就是由“炮队”的情报活动发端的。

极端疯狂，一朝覆灭

长期来，这支反革命“炮队”不遗余力地推行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以终成“四人帮”上台登基的“千秋大业”为目标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叶副主席，打击、诬蔑邓副主席，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但是，这一切阴谋都没有得逞。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美梦。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四人帮”及其“炮队”却是私心窃喜，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到了。王洪文的那个秘书居然丧心病狂地说，毛主席逝世了，有些事情好办了。他们要办什么事呢？

“炮队”掌管文艺的头目在毛主席病重时就已下令，指定刊载毒草话剧《盛大的节日》的一本《朝霞丛刊》要抢在国庆节前后出书，以迎接他们的主子上台登基。上台，上台，

“四人帮”日盼夜盼，眼睛快要盼出血来；上台，上台，

“炮队”日夜兼程，急匆匆地为主子赶路开道。请看下面这张日程表，它记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炮队”赤膊上阵、拚死拚活的那股反革命疯狂劲：

九月中旬，“炮队”大头目限令刊登悼念毛主席文章的

《学习与批判》第十期提前到九月底出版，说是到了十月里，“红白喜事挤到一起不好办”。——请看，他们竟然把毛主席逝世和“四人帮”预定的上台合称为“红白喜事”，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九月中旬，为张春桥拼凑理论体系的一本重点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五稿赶着付印，责令十月初出书。

九月中旬，王洪文的那个秘书打电话给“炮队”的大头目，传达张春桥的黑话，要“炮队”“振奋精神，准备斗争”。

还是九月中旬，“炮队”大头目从北京打电话通知掌管文艺的头目，在即将付印的《朝霞》中每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都要尽量添上为江青歌功颂德的词句，为江青上台鸣锣开道。

九月二十日左右，“炮队”大头目下令出版社，迅速出版他们私自炮制的无耻吹捧江青、抹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党史》。

九月二十三日，又是这个大头目，要出版社提前定稿、赶紧出版那本关于人民公社向两级所有制过渡的“调查报告选”，作为拼凑“张春桥思想”的重要一环。

九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那个秘书赶回上海，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上海的工作还没有经受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林彪一类上台的话，要准备打仗。”

九月三十日，“炮队”在提前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盗用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的文章。甚至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十月八日，“炮队”大头目还亲自到被他们控制的报社和电台特别关照：要多加几个“按既